

從盧家大屋看澳門世遺歷史城區的文化多樣性

朱宏宇 *

摘要 本文系統地梳理了盧家大屋的建造時空等歷史資訊，深入剖析了該建築的空間佈局、結構和構造方式、建築立面、門窗做法以及細部裝飾等營造技藝的源流、顯著特徵及其發展融合。本文試圖以盧家大屋為例，管窺當時澳門社會的歷史剪影，反映出來自中國、葡萄牙以及葡印果阿的不同文化通過人與人的交流和生活中的點滴滲透，從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共存。這種多元文化的交融無疑是澳門近代歷史建築的最大特色，印證了澳門歷史城區在十九世紀末葉的多樣性文化特徵。

關鍵詞 澳門世遺歷史城區；盧家大屋；文化多樣性

中國著名的國學大師季羨林曾說過：“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文化交流有過幾次高潮，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一次，是西方文化的傳入，這一次傳入的起點在時間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門”。¹澳門由中國邊陲小漁村發展成中外文化匯萃的國際性城市，無疑是由長期居住在這裡的華人和葡萄牙人共同完成的。但二元並不是澳門文化的全部，長期以來，外國人把澳門視為探險家的樂園和宗教避難所，前來澳門居留的不僅有來自西班牙、英國、意大利、美國、法國、比利時、丹麥、瑞典的西方人，也有來自日本、越南、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以至柬埔寨等東方國家的移民。這些移民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現代文明、生活方式，以及原居地的風俗文化。中西文化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互相碰撞，交流和傳播，磨合而成開放、兼收並蓄的澳門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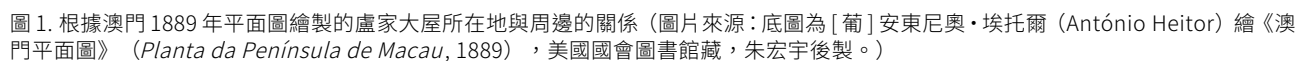
澳門文化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令多種文化生根、開花結果，影響至今，形成了一個各種思想相互寬容的和諧共處社會。但對於住宅文化來說，外來文化的積存及發揚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住宅文化是支配住宅構成的思想意識，慣性較大，是建築文化中最能體現人類總體文化發展方向和發展程度的一部分。²因此，如果

沒有長久日積月累的薰陶和潛移默化，外來的影響不會存留下來。澳門曾迎來送往許多不同文化，但最終能經歷時間考驗而對澳門近代居住建築產生深層次影響的主要是嶺南文化、葡萄牙文化以及經葡萄牙帶入的葡印果阿文化。世遺“澳門歷史城區”是由中國和葡萄牙的歷史街道、住區、宗教和公共建築組成的世界文化遺產，為四個半世紀內東西方的美學、文化、建築和技術的融合和交流提供了獨特的見證。它是中國境內現存年代最遠、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以西式建築為主，中西式建築互相輝映的歷史城區。這些遺產與現實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之間的關係反映了本土文化、外來文化對這一地區發展產生的影響，反映了多元文化融合而成的城區文化對人、對澳門近現代社會文化的發展的深刻影響。而在世遺“澳門歷史城區”內，有一棟位於傳統葡人核心居住區大堂巷的中式住宅——盧家大屋，在洋房遍佈的上層葡人階層集中之地，低調穩重而又格格不入。其建造背景、建築主體以及細部特徵都反映當時澳門社會的剪影，映射出澳門歷史城區在十九世紀末葉的多樣性文化特徵。

一、為甚麼會在葡人核心區中出現一座中式大宅？

* 朱宏宇，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博士。

十九世紀，葡萄牙人利用政治及軍事形勢



澳門研究

擴充其管治範圍，外商的到來和經濟的復甦促進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設力度並確定了澳門近代城市格局。在西式城市結構下，由於華人群體的不斷增大，基於長久以來華人和葡萄牙人的同處分治的習慣，澳門同時存在兩個涇渭分明的生活圈，葡萄牙人及外國人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區，即以大堂、花王堂，聖老楞座堂為核心範圍，並向外港及南灣、西灣發展，其中議事亭前地及龍嵩街為商業街區，南灣為大宅及外國商人居住的地區，西灣一帶則是別墅區。華人則集中於內港河岸一帶及媽閣廟附近居住（圖1）。

任何建築都位於一定的區域並被其榮繞，盧家大屋所處的大堂巷是聯繫澳門半島兩座重要的教堂建築，即主教座堂和玫瑰堂之間的通道，市政廳和大三巴牌坊也都在其附近，地理位置十分顯要。根據大屋內次天井簷口的題詩年份顯示，盧家大屋建成於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華人在葡人核心區內建立一座中式為主的住宅當然不是簡單的中西融合，其主人的顯赫社會地位至關重要，更是華人民族自豪感的堅定體現。盧家大屋是澳門著名商人盧華紹家族³的舊居。盧家積累的巨額財富在當時的澳門無人能及，對整個澳門社會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雖然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政府已失去澳門管治權，但是華人商業卻改變了國際貿易時代只能作為葡萄牙人經濟之補充的附屬地位，轉變為主控型，華商也漸次成為晚清澳門最廣泛、最富裕、最活躍的群體——商人階層。⁴他們是社會的中堅力量，對澳門的經濟起支配作用，並得到了葡人的接受與認可。

盧華紹選在葡人居住區建宅應有其實際考慮，最主要的應是便於與葡人之間的社交往來。十九世紀澳門經濟的發展帶動了歐洲享樂的社會風氣及生活方式，私人住宅在這時大量出現，其中一些豪宅更成為當時社會的交際場所。“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澳門看不到精彩的文藝演出，也沒有有趣的公共娛樂活動。但是，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動卻絢麗多彩、熱鬧非凡。……當時星期聚會頗為時髦，星期日在塞卡爾子爵官邸聚會；星期一市政秘書長恩里克·

德·卡斯楚官邸高朋滿座；星期二暹羅領事納迪諾·德·塞納—馬恩省·費爾南多在官邸招待商人；而星期三和星期四分別在軍人俱樂部和政府大廈相聚；星期五在移民事務員西班牙人坦科·亞爾家盡情歡樂；星期六改在阿爾皮諾·安東尼奧·巴合科律師私邸翩翩起舞。遇到生日、婚禮、洗禮慶典等活動，這些定期聚會或則二合一，或則被其替代。賓主開懷暢飲，載歌載舞直至深夜。……然而，最盛大的活動是總督查努阿利奧子爵本人在（1872年）10月31日為慶祝路易斯一世國王舉行的晚會。……新擴建的（政府）大廈燈火輝煌，70對客人參加的四場舞會開始……身穿無可挑剔的燕尾服和華美軍服的220位男士和服裝文雅、佩戴貴重珠寶飾物的79位貴婦人為這場充滿活力和雅趣的舞會增添了無與倫比的光彩。”⁵

然而為何不在葡人住宅區內建西式洋房或外洋內中的住宅呢？根據當時的時事推測大屋雖建成於1889年，但其始建時間應先於1887年，⁶即《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之前，葡萄牙人尚未獲得“永駐管理澳門”的特權。清朝嘉慶十九年（1814年），兩廣總督蔣攸銑等奏陳《夷商貿易情形及酌籌整飭洋行事宜疏》中，對華商在澳的建房樣式進行了規定和限制：“不准民人私為夷人服役，責成洋商通事稽查，其住居澳門及省城十三行之貿易民人，不得搭蓋夷人房，即售賣夷人衣履之舖戶亦不得用夷字店號，以杜勾通而嚴區別。”⁷可見建設之時清朝對華人建西式房子的限制仍在，華人不敢貿然西化。

其次是華商對傳統生活習俗和傳統中國倫理道德有所秉持，家族所信守的理念和傳承下來的信條透過住宅展現出來。因此，儘管盧九於1888年5月獲批加入葡籍之諭旨，⁸與西方人接觸較多，但從其身穿清朝官服，佩戴葡國授予的勳章的照片仍可見一斑。

二、盧家大屋的嶺南建築文化特徵

十九世紀中開始由於大量華人湧入，具中國傳統特色的民居也越來越多。這些移民以閩粵

華人為主，為澳門帶來了閩粵的嶺南文化、生活方式和居住形式。其中，由於和廣東更為靠近，且於澳門從事建築行業的多為粵人，從而澳門的民居建築一般都以廣東傳統建築型制為主。

（一）嶺南民居的院落式空間佈局

盧家大屋佔地面積約 550 平米，縱深長約 24 米，寬約 13 米，平面佈局採用傳統廣式三間兩廊民居形式演變而成的院落式住宅，建築有明顯的中軸線，三間三進，中央三進也稱為三座落或三廳串，即門廳、中廳、後廳三廳連貫排列，其間以天井進行分隔。這種在平面上以廳堂、天井、廊道來組成通風系統，利用三者風壓之差異產生氣流交換，從而達至通風及散熱效果，是嶺南民居解決炎熱、潮濕、多雨的氣候條件的基本手段（圖 2）。

盧家大屋中央開間寬約五米，門廳、中廳、後廳三廳之間以天井作為過渡。門廳進深約 2.5 米，其後的天井深為 3.6 米，由於天井的二層部分進深方向有兩條過廊，天井採光部分實際是僅 3.6×3.6 米的方形空間；天井之後是中廳，進深約 5.2 米；其後是 4.8×3.6 米的天井，最後是後廳，進深 3.5 米。這一系列位於中軸線上的廳堂，是家庭生活中的公共活動場所，承擔着家庭議事、會客、婚喪嫁娶、祭祀祖先等諸多功能。三進各廳之間不設實牆，採用可移動的木格門扇，既可開合以調節的空氣流動，也可在作大型活動之時臨時拆除以增大廳堂空間，靈活實用。兩側次間寬約 4.5 米，第一進與第二進之間同樣採用天井作為過渡，其中右側天井進深約 5 米，其間有花池。二層空間呼應一層佈置廳房，第三進也是兩層高，但由於一樓後廳層高較高，因此二樓採用閣樓形式，是用於供奉祖先靈位的祭祀空間。閣樓有通往屋頂平台的出入口，平台的設置既有晾曬功能，也便於建築屋面維修，可謂一舉兩得。

（二）嶺南民居的傳統建造方式

盧家大屋採用嶺南民居傳統的磚牆承重結

構體系，構造的方式為牆上承檁，檁上支椽，椽承雙層瓦屋面。雙層瓦屋面適用於澳門炎熱的氣候，即在單層屋面的瓦壟上再鋪一層瓦，瓦上再做瓦壟，上層瓦鋪砌到離屋脊 20—30 厘米處停止，這樣下層板瓦就成了隔熱板。雖然只有板瓦是架空的，隔熱板面積也只有屋面的二分之一，但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且利於防雨和排水。

（三）嶺南民居的立面處理及裝飾藝術

盧家大屋內開敞而外封閉，灰色的外立面典雅、素樸、傳統，在洋房林立的葡人核心區中顯得格外低調穩重，分外講究，彰顯大家風範。牆身採用造價昂貴的水磨青磚絲縫砌築，與一般的青磚相比，燒造水磨青磚的黏土用料講究並且還要配合精細的磨工，施工時需將青磚上下面鏟出凹面，留起齊整尖銳的四邊和平整光潔的面，砌築時，磚的周邊要緊密貼合，再以白石膏漿勾齊縫隙，使外觀達到嚴絲合縫的效果。磚牆下部墊砌規則的花崗岩條石，成青磚石牆角，至今仍保存得較好。大屋的建造也貫徹着炫耀的意向。從大屋的清水外牆可以看出，主人對住宅的投資巨大，每一塊清水磚的造價都相當之高，這在現存的澳門中式大宅中難得一見。青磚牆屋採用前後直坡頂結合兩側山牆的硬山形式，牆頭線條下面的灰色裝飾帶，是以黑色為底的水草、草龍圖紋，稱為“掃烏煙，畫草尾”，山牆的裝飾反映與海洋文化密切聯繫的寓意和傳統文化（圖 3）。

與平面空間的中軸式佈局相呼應的建築正立面同樣採用對稱式，中央入口處採用傳統廣東式凹門斗，又稱凹門廊式，也就是在三開間的中央凹進，形成門前的過渡空間，具有防風、避雨以及遮陽的效果，並進一步強化中軸對稱的穩定關係。大門外兩側採用經過人工處理的條石作門框，並作線腳處理。門框上有掛鉤，作掛牌匾之用。正門分三層，稱為“三件頭”：第一層為腳步門（矮門），即對開的小摺門，上面有雕花圖案，具有防止外部視線的干擾的作用；第二層為趟櫳，即可以拉合的柵欄式的

澳門研究



圖 2. 盧家大屋首層平面圖（上）、剖面示意圖（下）（圖片來源：朱宏宇、汪堅繪製，摘自《盧家大屋修復報告（0913000235）》成果文件，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委托，2009 年 4 月至 7 月。）



圖3. 盧家大屋透視圖（圖片來源：朱宏宇、汪堅繪製，摘自《盧家大屋修復報告（0913000235）》成果文件，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委托，2009年4月至7月。）

門，由15根直徑為10—12厘米的圓木橫排平行組合而成，具有通風和防盜的作用；第三層是雙扇對開全閉合的木板門，堅固厚實，是大屋最為重要的關防。

在裝飾藝術的處理上，嶺南傳統依然特色鮮明：功能性的木製門扇、屏門、門罩、掛落和橫批上雕刻着荷葉等寓意吉祥的花草圖案及詩句；入口門廳左側供奉門官土地的磚雕，是精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藝術品，兩側的對聯寫着“門從積德大”“官自讀書高”，反映了盧氏家族對中國傳統思想“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學而

優則仕”傳統儒家思想的認同（圖4）。大量觀賞性的牆頭灰塑題材豐富，造型生動，並在中國傳統基礎上吸收了西方的圖案設計以及利用水銀片作點綴，創意十足。其中《停雲》出自晉朝詩人陶淵明：“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⁹停雲灰塑中還有花瓶花卉，“瓶”與“平”為諧音，寓意“四季平安”；花卉包括芙蓉和牡丹花，“芙”與“富”為諧音，“花”即為“華”，牡丹代表富貴，蘊含“榮華富貴”（圖5）。

“瓜瓞綿綿”是大屋中最大的彩色灰塑，

澳門研究



圖 4. 盧家大屋入口門廳左側供奉門官土地的磚雕（圖片來源：陳顯耀攝）

寬約 3.9 米，高約 1.6 米，中央為 1 米直徑的圓形構圖，園內為漁、樵、耕、讀四組山水人物，漁和樵分別講述東漢嚴子陵和朱買臣的故事，耕和讀是描寫舜帝教民耕種及戰國蘇秦埋頭苦讀的情景。圓形構圖以外以綬帶做成博古架造型，各種瓜果飛禽至於其中。瓜果間以蔓帶（諧音萬代）相連，瓜則多子，寓意子孫萬代傳承。“瓜瓞綿綿”下的“鸚鵡奪錦”灰塑以“鸚”“鵡”諧音“英雄”，左右兩旁的白話詩“十載攻讀問學堂，要知富貴在文章。鰲頭湧出千心動，丹桂開時萬里香”；“三汲浪中龍爪現，九天雲外鳳呈祥。狀元二字題金榜，直到皇都作棟樑。”都是激勵子孫勤奮讀書，金榜題名。表現了尊書重道的人生哲學，是當時華人社會的縮影（圖 6）。



圖 5. 盧家大屋牆頭灰塑《停雲》（圖片來源：陳顯耀攝）

三、葡萄牙及葡印果阿建築語言與嶺南傳統建築語言的相容並蓄

澳門從土地荒蕪、人煙稀少的漁村發展為近 70 萬人口的國際性城市，其建築文化，無論是中式還是西式都是經由外部移植而來。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的澳門，西歐移民帶來了西方文化和西方建築式樣，影響了本地建築文化，在各式各樣的移植建築中，又以住宅建築佔的比例最高。葡萄牙作為澳門建築文化的移植源之一，其本身的文化其實也帶有一定的移植性。葡萄牙歷史上由於曾受到古羅馬人和西哥特人的統治，也曾受到來自西非摩爾人的入侵，其城市形態及建築形式既受到歐洲核心文化的影響，也受到阿拉伯文化的薰陶。葡萄牙人將西方建築文化移入澳門的同時，也引入了其他殖民地的文化，特別是從印度果阿及東南亞等地吸收的建築經驗，如貝殼窗和院落設計。

盧家大屋以中式建築傳統為本體，但其間大量的窗、屏門、屏窗等都體現出了嶺南傳統建築語言與葡萄牙及葡印果阿建築語言的完美融合，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創造出專屬於澳門的獨特建築語言（圖 7、8）。

單從建築正立面上窗的設計便可知建築是如何中西合璧的，窗的總體構成上採用了嶺南傳統民居的三層，其中內層是雙扇對開全閉合



圖 6. 盧家大屋灰塑《瓜瓞綿綿》（圖片來源：陳顯耀攝）

的木框玻璃窗；中間為鑄鐵欄杆，通風和防盜之用；但位於二樓的窗在最外層又分為上下三層，底層為源自葡印果阿的貝殼窗，只是構圖是中國傳統的六邊形而不是果阿的直條形。中央層為木製百葉窗也是外來的裝飾語言，上層為西式的半圓形彩色玻璃窗，窗之上做工細緻講究，瓜果和蝴蝶灰塑裝飾的圓弧狀窗楣也是受外來因素影響而出現的，中式傳統建築中較少出現。就這樣三種來自不同地區的建築藝術語言被統一在同一個木製窗框內，沒有絲毫的突兀與不適。側立面上幾何紋樣的漏窗花窗有中式陶製的，也有來自西方的鐵藝，起到阻擋視線的作用，同時，豐富活躍了建築的藝術氛圍。

盧家大屋室內的門和窗細緻精美，多種多樣，中式木門窗扇鑲嵌紅、藍色的彩色玻璃，這些彩色玻璃是澳門現存中式住宅中絕無僅有的佼佼者，不僅豐富了室內空間的色彩，更是中西韻味的完美融合。又如門楣上的裝飾雖以“祈求平安”的傳統中式圖案做裝飾，但一些花紋式樣（紅色的玫瑰花）明顯是吸收了西方的造型特點和構圖風格。再如後天井兩側的鐵窗花明顯是西式的，甚至受到了工藝美術運動的影響，其工藝也反映了當時具有一定水準的

鑄造技術和工藝。可見中西文化已在細節上互相借鑑，交融運用。而文化的交融是基於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才能達成的，側面地反應了社會的和諧。除此之外，盧家大屋的天花板採用白色的木雕天花板，圖案做以花草紋樣，既有裝飾美化效果，同時又可保護天花上部有良好的通風，避免木樑條受潮腐蝕。這種天花的做法同樣源自於果阿，並發展成為澳門西式建築必有的元素，在中式建築中應用較為罕見（圖 9）。

結語

盧家大屋傳統的院落式對稱佈局，反映了澳門華人對中華文化的尊重和民族自豪感，對華人生活模式的眷戀和堅守，“中國漢民族文化形成的矩形對稱住宅是為統一的、連續的文化特徵所決定，這種形式的住宅幾乎遍佈於整個中國，且幾千年不變，已成為一種最佳的美的權威概念。”¹⁰ 因此，即便十九世紀末的澳門已是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華人心底裡始終有一份割捨不掉的中華文化情結。即使是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和滲入，也只是在一些建築細部，如門窗、裝飾及材料等方面有所表現。在這其中，來自中國、葡萄牙以及葡印果阿的不同的文化既沒有互相拒絕，也不是全盤接受，文化

澳門研究



圖 7. 盧家大屋剖面圖 B-B、C-C（圖片來源：朱宏宇、汪堅繪製，摘自《盧家大屋修復報告（0913000235）》成果文件，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委托，2009 年 4 月至 7 月。）



Section C-C

澳門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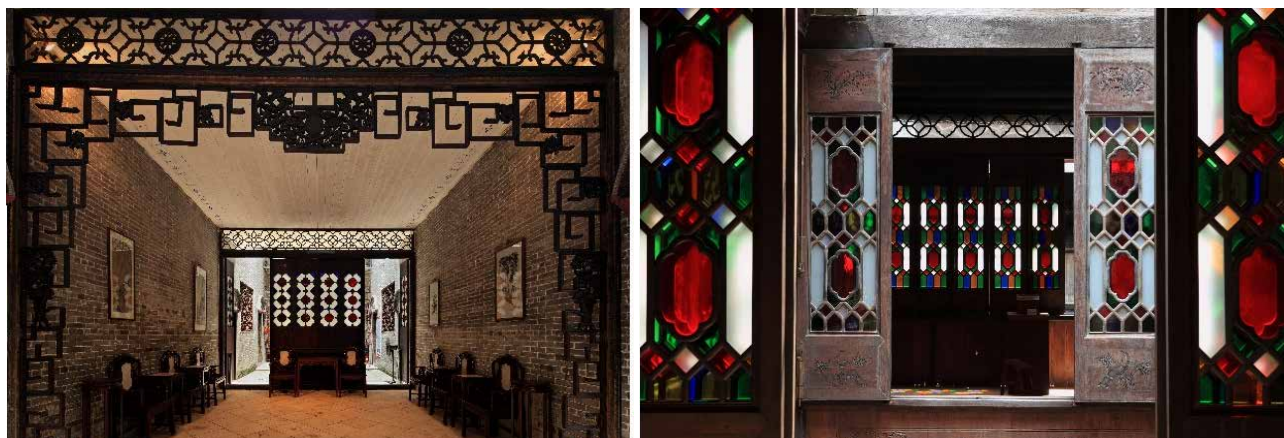


圖 8. 盧家大屋室內空間（圖片來源：陳顯耀攝）



圖 9. 盧家大屋室內透視圖（圖片來源：朱宏宇、汪堅繪製，摘自《盧家大屋修復報告（0913000235）》成果文件，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委托，2009 年 4 月至 7 月。）

通過人與人的交流，生活中的點滴滲透，慢慢地融合對方的優點和特色，而不是簡單而又生硬的並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在盧家大屋的建築藝術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從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諧共存，而這種多元文化

的交融無疑是澳門近代歷史建築的最大特色。

附：本文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編號：51608327）階段性研究成果。

註釋：

1. 黃啟臣、鄧開頌：《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
2. 參見陳凱峰：《住宅建築文化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
3. 盧華紹（1848—1907），又稱盧九，字育諾，號焯之，小名盧耆。廣東新會潮連鄉人，約於清咸豐六年（1857年）移居澳門，族譜記載其“少失怙恃，生計殊窘；弱冠後始至澳門，業錢銀找換；稍有蓄積，設寶行錢號；既而以善營商業，雄財一方”。盧華紹後來承充澳門賭權，成為澳門第一代賭王，是當時澳門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最有影響的華商代表之一。盧九及其子侄盧光裕、盧廉若等家族成員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領域，為近代澳門的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以及改善華商營商環境、緩和華葡關係、救濟貧困、傳播儒家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說，盧九家族是影響澳門歷史進程的重要華人家族之一。
4. 林廣志、呂志鵬：《澳門近代華商的崛起及其歷史貢獻——以盧九家族為中心》，《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第40—47頁。
5. [葡]潘日明神父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74年。
6. 根據林廣志博士所著《流金歲月——盧九與盧家大屋》，盧家大屋選址的時間約為1886年9月，參見林廣志：《流金歲月——盧九與盧家大屋》，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4年，第40頁。
7. 陳偉明著：《明清澳門與內地移民》，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2年。
8. “據華人盧九稟稱，年已逾狀，在澳門居住已歷三十餘年，置有產業，今請隸入西洋旗籍”。引自《葡國君主批准盧九入籍諭旨譯文》，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所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三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0—751頁。
9. 《停雲》詩為陶淵明思念親友而作。意為酒樽裡盛滿了澄清的新酒，後園內排列着初綻的鮮花，可是我美好的願望不能實現，歎息無奈，憂愁充滿我的胸懷。參見孟冬譯註：《陶淵明集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5頁。
10. [葡]潘日明神父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74年。

